

中国索引综录

卢正言 主编

ZHONGGUO SUOYIN
ZONGLU

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ZHONGGUO
SUOYIN ZONGLU

中国 索引综录

中国索引学会 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 合编

卢正言 主编

尚志明 副主编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索引综录/卢正言主编. —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
2000

ISBN 7-5326-0672-4

I. 中... II. 卢... III. 索引-中国 IV. Z8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25736 号

责任编辑 林申清

封面设计 何香生

中国索引综录

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

(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)

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所发行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3.25 插页 1 字数 373000

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200

ISBN 7-5326-0672-4/A·14

定价: 26.00 元

二十世纪的索引编纂与研究（代序）

潘树广

索引是获取知识的工具,捕捉信息的利器,是各项工作科学化 and 高效化的保障。近百年来,无数学者为索引的编纂与研究作出了默默的奉献。当我们欢庆人类在本世纪的各个领域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,不能忘记索引所起的作用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如果没有索引,人类在本世纪不可能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。

在 20 世纪行将过去的时候,回顾我国索引编纂与研究的历史,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 and 精神力量,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。

索引运动的萌芽

20 世纪前期,是我国的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过渡的转型期。索引促成了这个过渡,而它也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自身的过渡——从古典索引走向现代索引。

索引的编纂与研究,在我国已有悠久的历史。^[1]但现代意义的索引编纂与研究,则起源于 20 世纪初。“五四”前后至 20 年代后期,可说是索引的自觉期。万国鼎曾以“索引运动”四字概括这一时期索引编纂与研究的自觉性。1928 年,他在《索引与序列》一文中指出我国索引工作与欧美的差距,又盛赞清代章学诚、汪辉祖等人是索引的“先觉”,并欣喜地指出,目前索引工作已日益为学术界所重视,“盖中国索引运动,已在萌芽矣。他日成绩,唯视吾人如何努力矣”。^[2]

“五四”以来,提倡科学、提倡新文化的思潮猛烈地冲击着知

识界。知识分子痛感陈旧落后的治学方法束缚着科学文化的发展,纷纷要求改革,要求进步。当时的索引运动,就其精神实质而言,是大力提倡科学的治学方法,寻求提高科研效率的途径。

这一时期的索引运动究竟有哪些内容呢?万国鼎《索引与序列》一文未作具体述评。现据当时的有关文献,试从三方面作一分析。

一、理论研究的活跃

任何一个学术潮流的产生,都离不开理论的先导,索引运动亦然。索引运动是从索引功用论、排检方法论的讨论拉开序幕的。

1917年,林语堂在《创设汉字索引制议》一文中论述了索引与学术演进的关系,他说:“百年以还,欧洲学术可云浩博,然部勒区分一索即得者,则索引制之所赐也”,“近世学术演进,索引之用愈多,西人治事,几于无时无处不用索引以省时而便事”。^[3]这篇文章首次从日文引进“索引”这个术语,在中国索引史上有独特的地位。^[4]我国古代的索引,有玉键、针线、韵编、检目、通检等名称,自此,“索引”作为文献学术语逐步为学术界普遍接受。^[5]

大力提倡索引的,还有胡适、陈垣等著名学者。胡适在1923年1月发表的《〈国学季刊〉发刊宣言》中说:“不曾整理的材料,没有条理,不容易检寻,最能销磨学者有用的精神才力,最足阻碍学术的进步。若想学问进步增加速度,我们须想出法子来解放学者的精力,使他们的精力用在最经济的方面。”这个法子,就是将图书资料进行“索引式的整理”。陈垣1929年在燕京大学讲演时,慨叹我国“有长远的历史,丰富的史料,而无详细的索引”,认为这是“中国的四大怪事”之一。呼吁大力编纂目录索引,使学人“研究学问时间极省而效能极高”。^[6]

当时,学者们在论述中国索引事业的现状时,常以欧美的索引为参照系。但他们又清醒地看到,不能照搬外国的理论与方法,因为中国文献有其自身特点,何况汉字不是拼音文字,这就给索引的排检带来很多困难。如何制订适合中国典籍和汉字特点的索引法,就成了学术界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。例如,林语堂指出按字形编排图书索引之不便,提出按“国音新韵”三十六韵母编制书名、人名索引。^[7]接着,刘复指出林语堂的索引法太深,太烦,认为“索引这一件事,总是愈简单愈好”,于是提出一个自称“极笨极笨,说穿了一钱不值的索引法”。其编码方法是取书名的字数为第一个码字(用汉字),然后取书名起首三字的笔画数,依次用阿拉伯数字记之。如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的编码是“十二 635”。此法虽简单易学,但实行起来亦有困难。后来袁同礼在给刘复的信中,又指出他的索引法的局限。^[8]林、刘、袁三人各抒己见,是当时索引研究气氛活跃的一个生动事例。

在杂志索引方面,刘纯的《杂志索引之需要及编制大纲》^[9]、钱亚新的《杂志和索引》^[10]等论文,对杂志索引的重要性作了理论说明,并在编纂方法上作了具体阐述。

二、各类索引相继出版

专书逐字索引,有蔡廷幹 1921 年编成的《老解老》。蔡氏编纂此书的本意是“以经证经”,全书的主体是“经文”和“串珠”。“经文”系老子《道德经》全文;“串珠”系将《道德经》中每个字出现的次数以及见于何章何句一一列出,属字词索引,洪业称之为“堪靠灯”(Concordance),并说:“中国人为旧书作堪靠灯,似当以此为最先。”^[11]

书后索引,有杜定友为其所著《学校教育法》编的索引(1925),陈乃乾编的《四库全书总目索引》(1926)等。前者“将书

中各种节目及重要之点,逐一提出”,以笔画、笔法为序,是现代中文书籍最早附有书后索引的。

报刊索引,有清华政治学研究会编印的《政治书报指南》(1923)、北京清华学校教育学社编的《教育论文索引》(1924)、杜定友主编的《时报索引》(1925)、王重民编的《国学论文索引初编》(1929)等。其中《时报索引》是我国现代最早的报纸索引。

三、索引组织的建立和索引课程的开设

索引编纂的技术性要求高,工作面广量大,需要有组织保障。1925年成立的中华图书馆协会,对索引的编制曾起过组织与促进作用。在1929年召开的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上,又专门成立“索引检字组”,着重研究“完善之汉字排检法”。大会还通过万国鼎、李小缘提出的《通知书业于新出版图书统一标页数法及附加索引案》。此外,金陵大学图书馆曾于1926年组织“杂志索引合作社”。洪业主持的引得编纂处,亦于20年代末开始筹办。

1928年秋,万国鼎开始在金陵大学讲授“索引与序列”课。大学开设索引课程,这在国内尚属首次。

索引事业的奠基

30至40年代,是索引事业的全面奠基期,主要表现在以下五方面。

一、索引专著的问世

钱亚新《索引和索引法》(1930)和洪业《引得说》(1932)的相继出版,是我国索引事业进入奠基期的重要标志。

《索引和索引法》一书吸取国外的索引理论,并结合中国文

献的实际,较全面地论述了书籍、杂志和报纸的索引。1937年,钱亚新又发表了《中国索引论著汇编初稿》,收录有关索引与索引法的著作和论文,兼录各种索引,并有提要,为1936年以前的索引编纂与研究作了总结性的工作。洪业《引得说》重点论述索引的意义与中国古籍索引的编纂。其中关于索引编纂工作十大环节的论述,融科学性、理论性、实践性于一炉,精密周详,至今仍有很高的参考价值。

二、索引编纂专门机构的建立

30至40年代成立的索引编纂机构,影响最大的是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和中法汉学研究所通检组。引得编纂处1930年秋成立于北京,由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洪业任主任,编辑有田继综、聂崇岐(1933年任副主任)、李书春,另有经理、抄录员等,共计十余人。1941年12月太平洋事变,燕大被日寇封闭,引得编纂处工作被迫中断,1945年恢复工作,1951年停办。该处所编索引,总名“汉学引得丛刊”(Sinological Index Series)。自1931年至1950年,共计出版64种81册,分两个系列编号:一为引得,计41种50册,如《说苑引得》等;一为引得特刊,计23种31册,一般附有原文,如《论语引得》等。^[12]

中法汉学研究所通检组1942年成立于北京。当时正逢引得编纂处工作中断,聂崇岐入通检组工作一个时期。1947年由吴晓铃任通检组主任。1953年停办。通检组编辑出版的古籍索引总名“中法汉学研究所通检丛刊”(1948年改为巴黎大学北平汉学研究所通检丛刊)。自1943年至1952年,共计出版索引15种,^[13]如《论衡通检》等。

以上两家索引编纂机构,在30年代初至50年代初的20年间,共计出版索引79种,占我国在1950年前出版的中文图书索引总数的一半以上。60年代以来,我国内地、台湾和美国、日本

多次影印出版上述索引,亦可看出它们的价值和影响。

三、各界学者共同关心索引事业

20年代,关心索引的主要是图书馆界人士,到30年代,形成了历史学、语言学、文学等各界人士共同关心索引事业的可喜局面。

洪业、聂崇岐、王钟翰都是著名的历史学家,吴晓铃是著名的戏剧家和语言学家,他们分别主持过引得编纂处和通检组的工作。语言学家黎锦熙对索引也有浓厚的兴趣,他20年代在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经反复试验,觉得以“国音索引法”排列资料卡片最为方便。1936年,黎锦熙作了《关于索引的方法》的报告,大力提倡“国音索引法”,认为此法之简便程度,“恐怕现行任何方法也做不到”。^[14]

文学家郑振铎在1937年写了8000余字的论文《索引的利用与编纂》,对索引的功用作了深刻而形象的论述,并对索引的编辑出版发表五点意见:(1)专书索引须附本书而行;(2)索引的编纂贵在分工合作,各个编纂机构应有联合的通讯,统一规划,避免选题重复,并研讨编纂方法的改进;(3)检字法的采用,应注意通行性;(4)期刊论文索引,所收期刊应“求全求备”; (5)降低索引的定价。^[15]

郑振铎的这篇论文,和钱亚新1937年发表的《中国索引论著汇编初稿》,同是30年代带有总结性的索引著述,但研究索引史者,对郑氏极少提及。郑氏还身体力行,编了《缀白裘索引》等。郑氏对索引事业的贡献,是应当在索引史上写上一笔的。

四、观念的改变

过去人们对索引往往有两种偏见。一是认为索引编纂是简单劳动,人人可为;二是认为索引是“懒人用的低劣的拐杖”,助

长“辗转稗贩”的空疏学风。中外学者都有过此类议论。^[16]时至30年代,学者们在使用与编纂索引的过程中深切体会到,索引实与学术发展相辅相成。郑振铎指出,“人名及地名索引为‘索引’中比较容易编辑的一部分工作,但也非需要专门家的细心钩稽、分别条目不可的”。至于专书关键词索引,更是“最难着手”,进而强调:“编著专书的索引,第一个条件,要对那部书有研究,第二个条件,要懂得‘索引’的编纂方法,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”他特别推崇洪业主持编纂的《引得》,认为那是“具有近代的索引之真正意义者”。^[17]

文献学家王重民在30年代主持编纂《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》时,也清醒地看到索引编纂必须取得各学科专家的帮助。他曾约请顾颉刚审阅书经类,请余嘉锡审阅四书类,刘盼遂审阅小学类,谭其骧审阅地理类,李俨审阅天文算法类等等,纠正了原稿的一些错误。

学者们还体会到,编纂索引有助于对文献进行深入的研究,从中发现问题。例如清代国史馆编写的清人列传与民国间撰写的《清史稿·列传》互有去取,同一人物亦有详略异同。清史专家孟森为了彻底搞清这一问题,便取国史馆列传的三种本子与《清史稿·列传》合编为索引,除了理清各本的去取情况外,还发现了不少问题。^[18]

五、索引品种的增多和质量的提高

索引品种的增多,可从学科覆盖面和编纂体式两方面进行考察。

20年代,索引的编纂主要在人文社会科学范围。进入30年代后,综合性的和自然科学范畴的索引明显增多。1930年,上海《人文》杂志每期附有《最近杂志要目索引》。这是我国现代最早的一种按期出版的综合性杂志索引。随后,有南京中山文

化教育馆编的《期刊索引》(1933年创刊)、《日报索引》(1934年创刊),广州岭南大学图书馆的《中文杂志索引》(1935年版)等。自然科学方面,有金陵大学的《农业论文索引》,交通大学的《工程论文索引》,王庸等的《中国地学论文索引》等。

从编纂体式看,有逐字索引,人名索引,地名索引,书名索引,篇目索引,句子索引,关键词索引等等。特别值得注意的,是关键词索引的大量出现——这是30年代至40年代索引领域的新景观。在引得编纂处和中法汉学研究所通检组所编的索引中,关键词索引占了很大的比重。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的《十通索引》和《嘉庆重修一统志索引》,也是编排细密的关键词索引,至今仍有很大的实用价值。

这一时期索引质量的提高,主要表现在学术含量的增强。如引得编纂处编辑出版索引,十分重视序言的撰写。序言论述被编索引的古籍的成书过程、版本源流、学术价值,是学术论文,又是读书指导。撰序者,多是专家学者,如洪业、聂崇岐、齐思和、周一良等。洪业所撰序言即达十余篇,其中《礼记引得序》洋洋数万言,实是礼学源流考。聂崇岐的《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序》二万五千言,堪称中国目录学简史。

抗战时期,延安地区的图书馆工作者也曾编制过一些索引,如延安中山图书馆为了配合宪政问题的研究,编印了《宪政论文索引》,还定期出版每月全国报纸杂志论著索引。^[19]

索引事业的发展

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科学文化事业迅速发展,索引的编制也不例外。新中国的头几年,书目索引的编纂数不断增长。1949年为2种,1951年为44种,1953年为179种,1955年为393种,1956年为453种。至1957年,累计为2364种。^[20]

一、党和政府重视索引工作,调动了索引工作者的积极性

1956年,毛泽东发出“向科学进军”的号召,广大科学文化工作者欢欣鼓舞。同年8月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社论《向科学进军中的图书馆工作》,提出“应该积极地有计划地进行书目和索引的编制工作”。周恩来在1956年主持制订我国第一个发展科学技术的长远规划时,把情报工作的建立列为重要任务之一。接着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了科学情报研究所,在国家技术委员会下设立了技术情报局,1958年又合并为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,对全国科技情报工作加强了领导,并出版各种文摘、索引。各专业部门及省市也相继建立了情报机构,编印各种文摘和索引。索引工作者的经验交流、理论研究也日趋活跃。如中国科学院1959年1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院图书馆工作会议,中心内容是文献参考工作,并把“书目、索引、文摘的编制与供应”列为文献参考工作的第一项。会议交流了10余篇以索引编制为主要内容的论文。^[21]

二、《汉语拼音方案》的颁布,推动了索引的改革

1958年,《汉语拼音方案》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批准颁布。《方案》除了用于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之外,还有编制索引等多项用途。周恩来在《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(1958年1月10日)》中指出:“汉语拼音方案还有其他方面的各种用处,例如可以用来音译外国的人名地名和科学技术术语,可以在对外的文件、书报中音译中国的人名地名,可以用来编索引。”吴玉章也说,《方案》“可以解决编索引的问题”(《关于当前文字改革工作和汉语拼音方案的报告》)。自1958年至1962年,报刊上发表了大量讨论用汉语拼音方案编制索引的文章,分析了汉语拼音序索引法易学易检、编排稳定、科学性强等优点。汉语拼音索引法日益为社会所重视,并为计算机汉字输入采用拼音编码法

打下了基础。

三、高校工具书使用法课程的开设,促进了索引的研究与推广

50年代至60年代前期,许多高校为了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研究能力,开设了工具书使用法课程。索引的知识和各类索引的使用,是工具书使用法一项主要教学内容。当时,一些高校编印了该课程的教材,如西南师范学院吴则虞1954年编印的《中国工具书使用法》、南京师范学院赵国璋1958~1959年编印的《语文工具书使用法》(1962年修订重印)等。一些对工具书研究有素的先生,还积极向社会普及索引等工具书的知识,这都有效地推动了索引的研究与推广。

四、索引编纂增强了计划性和协作性

国务院于1958年2月成立“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”,制订了整理出版文史哲古籍的十年规划。1959年,经规划小组讨论,并与高教部、北京大学协商,决定在北大中文系设置古典文献专业。古籍研究和古籍索引的编纂,走上了有计划发展的道路。

科技文献方面,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对各主要学科文摘、索引的编辑出版统一规划,初步形成了检索期刊的体系。

全国大协作编制高质量书目索引的一个典型事例,是《中国丛书综录》的编纂。《综录》是在全国40余所图书馆的通力协作下,在“前人所梦想不到的极其有利的条件下进行的”。^[22]从草创到定稿,只用了一年又三个月。《综录》收录丛书2797种,不但在数量上超过以往任何一种丛书目录,^[23]而且有收藏情况表和详备的索引。直至今日,《综录》仍是古典文献工作者须臾不离的工具书。

五、索引的学科覆盖面扩大,质量逐步提高

在 30 至 40 年代,我国的索引编纂虽已广泛涉及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,但重点毕竟是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。到 50 至 60 年代,学科覆盖面有了很大的扩展。

自然科学方面,定期题录式索引在 1957 年主要有《物理期刊论文索引》和《化学期刊论文索引》两种。到 1964 年,发展到 56 种。^[24]人文社会科学方面,各大学科的论文索引陆续出版,如《中国史学论文索引》、《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》、《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索引》等。报刊索引也有了很大的发展。除了《全国主要报刊资料索引》(后更名《全国报刊索引》)之外,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光明日报》、《解放军报》、《解放日报》、《文汇报》等大报都编印本版的索引。

索引的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,如《中国史学论文索引(第一编)》(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版)的正文分类编排,书末有“辅助索引”,把论文标题中出现的关键词以及论文所属类目名一一立目。这样细致的辅助索引,在以往的论文索引中是很少见的。又如《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》,把我国古今学者研究《史记》的专著、笔记、论文等分类编排,还著录了外国学者的专著和论文,视野开阔。尤其值得称道的是,该索引还揭示唐宋元明笔记中有关《史记》的文字条目,启发和推动了当时为数不多的笔记索引的编纂。商务印书馆、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古籍多附索引,亦以编排细密受到读者的欢迎。

六、注意编译国外的索引,介绍国外索引工作的经验

1956 年至 1963 年,《列宁全集索引》、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主题索引》、《〈资本论〉索引》先后编译出版。上述索引采用主题法,这对我国学者启发甚大。1961 年至 1964 年,我国学者发表了《介绍几种全苏出版物登记局的现行书目索引》、《美国 CA 的

索引工作》、《用字母穿孔计算机编制关键词索引》等文章,介绍世界上比较先进的索引工作和索引方法,也开阔了我国索引工作者的视野。

索引事业的繁荣与索引学的建立

正当我国的索引事业稳步发展之时,“文革”使我国人民遭受一场大灾难,索引工作也不例外。《全国主要报刊资料索引》等一大批检索期刊被迫停刊,许多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索引虽已编好却不能付印。这时触目皆是者,属于“密切配合中心运动”的索引。20年代兴起的索引运动,此时变成“运动索引”。但也应看到,“文革”后期,一些有事业心和责任感的学者,在动辄得咎的处境中,仍默默无闻地为索引事业作艰苦的努力。1976年10月,“四人帮”被粉碎,十年动乱结束。中国的索引事业复苏,并逐步走向繁荣。

一、索引论著数量的增多和质量的提高

80年代以前,我国出版的索引论著主要有钱亚新的《索引与索引法》和洪业的《引得说》。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,出版的索引论著有10余种(含编著、译著和论文集),如肖自力等编译《分类目录主题索引编制法》,潘树广编著《古籍索引概论》,王知津、王津生译《索引的概念和方法》,傅兰生编《主题标引与索引技术》,赖茂生等译《索引编制工作手册》,侯汉清编著《索引法教程》、《当代分类法主题法索引法研究》,黄恩祝著《应用索引学》,以及由葛永庆主编的系列丛书《索引研究论丛》等。

上述索引论著与80年代以前的索引论著相比,有两点明显的进步:一是传统的文献目录学与现代图书情报学相结合,学术视野开阔,理论色彩增强;二是计算机技术在索引编纂中的应用

日益受到重视,论述不断深入。

二、索引知识空前大普及

80年代以来,索引知识的普及程度,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。促成索引知识大普及的重要因素有二:其一,1979年以来,中国图书馆学会和各省市图书馆学会相继成立,重视对读者进行书目索引的利用的教育。中国图书馆学会在1990年开展的二次文献评奖活动(这是历史上首见的全国性奖项),有力地推动了索引的编纂和宣传。其二,各高校根据教育部的指示,普遍开设文献检索课。自1984年至1988年,约有130万大学生接受文献检索课的教育,而索引是其中的重要教学内容。

三、索引编辑出版的配套化和学术含量的增强

索引编辑出版的蝉联配套和优化,突出地表现在人名索引和传记资料综合索引方面。例如,1978年,“二十四史”和《清史稿》的校点本全部出齐,与此同时,《史记人名索引》、《汉书人名索引》等各史人名索引,亦相继问世。

又如,自30年代至40年代初,引得编纂处陆续出版了宋、辽、金、元、明、清各朝的传记资料综合索引,但宋以前和清以后的传记资料均无综合索引。1982年和1990年,傅璇琮等编的《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》和复旦大学历史系编的《辛亥革命以来人物传记资料索引》先后出版,填补了两头空白。

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学者,也为索引的蝉联配套作出了重大贡献。早在60至70年代,香港黄福銓就编印了《史记索引》、《汉书索引》、《后汉书索引》、《三国志索引》。这套索引与引得编纂处编的《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》等索引的不同之处,是采用类书的分类方法,可以与引得编纂处提供的检索途径互为补充。台湾学者在70至80年代编印的宋、元、明各朝传记资料索引和

《清代传记丛刊索引》,既吸取引得编纂处《四十七种宋代传记综合引得》等索引的成果,又大范围拓宽了文献搜集面。

索引的学术含量的增强,是这一时期的索引的又一特点。这里所说的学术含量,包括两个方面:一是索引编纂过程中所投入的科研力量;二是研究成果在索引中直接反映的程度。

《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》是学者编索引的一个典型事例。傅璇琮等学者首先对各种书籍的史料价值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,确定以 83 种书籍作为文献源。在索引编纂过程中,对各书记载的异同进行考证,将考证成果以小注形式分别排印于索引各页的页末。总计有小注 1810 条,平均每页 2.62 条。这些小注,实际上是学术笔记和校勘记,体现了索引的学术水平。其他如《古今图书集成索引》、《辛亥以来人物传记资料索引》,也以学术含量高而受到学界的赞誉。

四、索引编纂的标准化和品种的多样化

标准化是提高索引编纂质量、促进文献信息交流的重要一环。80 年代以来,我国颁布了一系列与索引编纂有关的国家标准,如《检索期刊条目著录规则》、《检索期刊编辑总则》、《文献主题标引规则》(修订后改称《叙词标引规则》)等。许多索引陆续按照国家标准编制。如具有广泛影响的《全国报刊索引》,自 1991 年第 1 期起用计算机排版,按照《检索期刊条目著录规则》进行著录。

索引的品种也日趋多样,突出的事例是引文索引(citation index)的创刊。引文索引是本世纪 60 至 70 年代在国际上兴起的索引新品种,但长期以来,我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引文索引。1995 年,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编辑出版的《中国科学引文索引》创刊,结束了中国没有自己的引文索引的历史。又如台湾学者在 70 至 80 年代编印的宋、元、明各朝传记资料索引,附列